

從范仲淹的〈岳陽樓記〉論仁者胸懷

董金裕*

提要

北宋名政治家范仲淹在回應有同年之誼的好友滕宗諒之請，所撰寫的〈岳陽樓記〉中，於先紹述岳陽樓的大觀，並分別描繪在不同天候所見，因而引發的雨悲、晴喜之情後。除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勸慰被貶謫中的好友以外，更推求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古仁人之心，並以之為典範而與好友互相期勉。

全文於探討范仲淹寫作〈岳陽樓記〉的寫作緣起，並略述其刻克力學，自幼即胸懷大志，恆以天下為己任之後，進而分從（一）、購置義田，贍養親族。（二）、體恤災民，以工代賑。（三）、防撫兼施，安定邊疆。（四）、興學設教，培育士子。（五）、獎掖後進，識拔人才。凡此多方面的表現，以見他能如其所言，充分展現仁者的胸懷。對於青年學子極具有啟示作用，期能培養其宏偉的格局、高尚的情操，以有裨於社會的健全發展。

關鍵詞：范仲淹、岳陽樓、滕宗諒、洞庭、仁者胸懷

壹、前言

姚鼐《古文辭類纂》將古文文體分為十三類，並將其中的「雜記類」再細分為四小類：山水遊記、亭臺樓閣記、書畫器物記、人事雜記。其中亭臺樓閣記即有三篇文章曾被選錄為高中國文教材，此三篇為：1、范仲淹（989-1052）〈岳陽樓記〉，2、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〈醉翁亭記〉，3、蘇轍（1039-1112）〈黃州快哉亭記〉。

三記內容雖不相同，但有其主要共通點：一為作者於寫作時皆在貶謫之中。二為所記雖然為樓為亭，但對建物的外觀及內部結構皆未述及。三為各文皆能融記事、寫景、抒情、議論於一爐，然各有所重。

另三文的作者中，歐陽修、蘇轍皆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，范仲淹雖非古文家，但對宋代的古文運動，有其先導之功，其反對華靡浮薄的文風，強調文當有益於教化等主張，後來皆為歐陽修承繼。此外，范仲淹的詞作，如〈蘇幕遮〉碧雲天，黃葉地、〈漁家傲〉塞下秋來風景異等，皆頗膾炙人口。故范仲淹雖不以文學名家，但任何一種中國文學史的著作，皆不敢對他略而不提。

*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，孔孟學會秘書長，國際儒學聯合會榮譽顧問。

范仲淹於寫作〈岳陽樓記〉時，除自己被貶以外，請託他寫作此文的滕宗諒也在貶謫之中。另范仲淹雖然所記者為岳陽樓，但他其實並未到過岳陽樓，對岳陽樓的形制並不清楚，只能在文中說滕宗諒「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」，並於描述岳陽樓形勢之大觀後，稱「前人之述備矣」，簡略帶過。隨後即極力描述登樓觀覽者，因天候晴雨不同，或自己遭遇的順逆，所引發的或悲或喜之情。最後則將全文歸結於末尾所敘：「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……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』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！」既然所歸與而引以為典範者乃古仁人，亦即以古仁人為其追求的目標。究竟范仲淹如何踐行其言，以展現仁者的胸懷，此即本文所欲探究闡述者。

貳、〈岳陽樓記〉的內容大要

為理解方便，茲先將〈岳陽樓記〉全文共 368 字，分為六段，錄之於下，而述其大要：

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，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，屬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；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！然則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；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；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；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；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，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！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；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！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，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；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；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！

時六年九月十五日。¹

以上六段，各有其重點：

首段敘明寫作緣由。

第二段記敘所見洞庭湖景致，並引發下兩段登樓者覽物心情有異。

第三、四兩段分述於不同天候所見，而顯現的雨悲、晴喜之情。

第五段論述仁者胸懷，表達嚮往心志。

¹ 范仲淹撰：《范文正公集·岳陽樓記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《萬有文庫叢要》，1965年2月臺1版），頁95。

第六段敘明寫作時間。

參、〈岳陽樓記〉的寫作緣起

范仲淹之寫作〈岳陽樓記〉並非出於自發，而是受老友滕宗諒（字子京）的請託，即記文一開頭所云：「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……乃重修岳陽樓，……屬予作文以記之」是也。

滕子京，名宗諒，字子京，河南洛陽人，於北宋仁宗慶曆四年（1044）因故被貶官至岳州巴陵郡（今湖南省岳陽市），雖難免矢志落寞，但仍勵精圖治，並重修與黃鶴樓、滕王閣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，完工之後乃致書被貶於鄧州（今河南省鄧州市）的范仲淹，央請他作記。

按范仲淹與滕宗諒皆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中進士，有同年之誼。曾多次在朝廷或在他方同事，尤其是當范仲淹在泰州（今江蘇省泰州市）任官時，曾修築海隄以除洪害（後該海隄被稱為范公隄），當時也任職於泰州的滕宗諒主動襄助其事。其後范仲淹奉命守邊以防範西夏入侵，滕宗諒即為其部屬而有輔佐之功。范仲淹對滕宗諒的才能深表贊賞，曾多次向朝廷薦舉，滕也因而獲得重用。凡此皆可見兩人交情之深厚，與彼此惺惺相惜之情。

按滕宗諒之請託范仲淹作記，固然基於兩人交情之深厚，但也有其特別的用意，其在致范仲淹書中說：「竊以為天下郡國，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，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，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，文字非出於雄才鉅卿者不成著今古。」²意謂山水瑰奇之處才能算是勝景，山水勝景必須有樓觀可以登覽才能顯名，登覽勝景的樓觀必須有文字記載才能流傳久遠，文字記載必須出於名家之手才能永垂不朽。進而推崇范仲淹的文章、器識、功業等可以使岳陽樓瀕臨的洞庭湖勝景名垂千古。可見他是想藉重范仲淹的多方面成就，與洞庭的山水勝景等相得益彰。但考慮到范仲淹並未到過岳陽樓，乃隨信附上一幅〈洞庭秋晚圖〉以供參考。范仲淹即據之而寫下此文，也果如滕宗諒所言，山水勝景、供登覽的樓觀等，皆因而名傳至今。

范仲淹接受請託之後，既基於與滕宗諒深厚的交情，更念及彼此皆在貶謫之中，推想登樓者因天候之不同，難免即景而生情。或於陰雨時因所見淒涼景象，興起去國懷鄉、憂讒畏譏的悲憤之感；或於晴朗時因所見明媚景象，興起心曠神怡、寵辱皆忘的喜悅之情。於是乃以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，勸慰滕宗諒。更進而就自己平日蘊蓄所得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仁者胸懷，與滕宗諒互相期勉。

肆、范仲淹展現之仁者胸懷

范仲淹兩歲喪父，其母貧無所依，再嫁朱文翰，范仲淹乃改姓名為朱說。及至成年以

² 李遇時修，楊柱朝纂：《岳州府志卷二十七·滕宗諒求記書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《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》，據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影印，1992年），頁296。

後，始知自己身世，遂感泣辭母，赴五代大儒戚同文曾講學於此的應天府書院，³刻苦力學。其後以朱說之名參加科考，於登進士第後，迎母奉養，並上表請復原姓名。

范仲淹年幼之時即懷有大志，恆以天下為己任，其後中舉而任官各地，雖屢起屢落，仍不改其初志，一生所行饒具仁者胸懷，其例甚多。茲據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、《宋元學案·高平學案》、樓鑰撰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，及其他史料所載，列舉其犖犖大者數事如下，以概其餘。

一、購置義田，贍養親族

范仲淹於仕宦顯達後，感念繼父朱文翰的養育之恩，為求報答，乃向朝廷乞贈朱氏為太常博士，朱氏子弟亦有三人得蔭補官，可見其知恩圖報之心。

范仲淹於恢復本姓後，對蘇州吳縣（今江蘇省蘇州市）族人頗為照顧，一開始力有未逮，及至貴顯後，乃以其俸祿及賞賜所得，購置土地數千畝，號曰義田，以田租所入，養濟群族，凡族中之人的衣食、嫁娶、喪葬等皆有補助。其流風餘澤，直到南宋末年仍行之不衰。與范仲淹同時代，年歲稍晚的錢公輔即撰有〈義田記〉以記其事。⁴文中引春秋時代齊國國相晏嬰生活儉約，但能濟助親族及齊國之士三百餘人。可惜及身而止，因而於文中引用孟子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之言，以為晏嬰所行為近之，更稱「觀文正之義，賢於平仲，其規模遠舉，又疑過之。」⁵可謂推崇備至。

二、體恤災民，以工代賑

范仲淹中進士之時年僅二十七，即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，敢於諫諍，曾進呈萬言〈上執政書〉，奏請改革吏治，裁汰冗員，甚至於冒殺身之禍，請求垂簾聽政的太后還政宋仁宗。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）江淮一帶天下大旱，兼蝗災蔓延，范仲淹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，賑濟受害百姓，不料朝廷竟不回應。范仲淹乃再度上疏，稱宮廷中人如半日不食，當何如？今災民遍野，豈可置而不問？皇帝乃命他前往處理，所至開倉濟助災民，減低人民稅役，禁止公家浪費。甚至將災民充飢的野草帶回朝廷，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奢靡之風。其後不論在朝或在地方為官，無不視民如傷，其對民生的關切由是可見。

尤其值得稱述者，宋仁宗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江浙一帶鬧饑荒，范仲淹在杭州任太守，除開倉賑濟災民以外，以當地居民喜歡划船競渡，又篤信佛教，范仲淹乃鼓勵人民競渡，並要求佛寺大興土木，自己則日日在湖上宴客，又重修官舍。有人以為荒淫，上奏朝廷彈劾他不恤荒政，縱酒行樂，勞民傷財。他乃回報以為饑荒之歲，工價較低，大興土木可使饑民有工作機會。並稱所以宴遊、興造，皆欲以有餘之財，以惠貧者，如此則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，仰食於公私者，日無慮數萬人，荒政之施，莫此為大。果然那年兩浙饑民流

³ 按《宋史》及《宋元學案》皆云范仲淹「依戚同文學」，但據《宋元學案補遺》載王梓材按語，可知戚同文逝世時，范仲淹尚未出生。故范仲淹到應天府就學時，書院其實係由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持，但書院仍保留戚同文的遺風，而對范仲淹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
⁴ 按錢公輔所撰〈義田記〉亦曾被選錄為高中國文教材。

⁵ 按晏嬰，字仲，諡號平，故稱晏平仲。

徙各地，只有范仲淹治理下的杭州平安無事。范仲淹如此作法，表面上似乎是反其道而行，其實是有其深謀遠慮。如今以工代賑之舉普遍推行於政府各級機關，范仲淹可謂乃其始祖也。⁶

三、防撫兼施，安定邊疆

宋仁宗在位時，原本稱臣於宋的西夏國國王李元昊自立為皇帝，建國號為大夏，並發兵犯邊，宋軍屢為所敗，陝西形勢岌岌可危。朝廷乃命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，前往征討。韓琦舉薦范仲淹為副使，兼延州（今陝西省延安市）知府。范仲淹到任之後，採取堅壁清野方式，選擇險要之地築城，並修復廢寨，大開屯田，構築堅固的防線。更全面檢閱軍隊，嚴格訓練，以增強戰力，培養鬥志。將州兵分屬六將，每將三千人，採取穩紮穩打策略，敵人來犯則視其眾寡，輪番與之交戰，敵去則不追擊，以免涉險，並保存實力。

至於近邊的外族，除了西夏以外，尚有羌人部落甚眾，本為李元昊收買，願為嚮導，其後雖事迹敗露，然猶心懷兩端。范仲淹乃巡行邊疆，並以詔書犒賞諸羌，檢閱其人馬，且與之立條約，明賞罰，諸羌悅服，遂為其所用。

范仲淹主持邊務數年，號令嚴明，防撫兼施，深受軍民愛戴。不僅羌人稱他為「龍圖老子」，即使西夏人也說：「小范老子，胸中自有數萬甲兵。」⁷相約不敢侵犯，德威遠播。李元昊見事無可為，乃又稱臣請和。

由上所述，可見范仲淹除文事以外，對於武備亦頗擅長，而有其策略，展現其防守邊疆的功績。

四、興學設教，培育士子

范仲淹年輕時曾入五代大儒戚同文主持過的睢陽書院就學，雖然當時戚同文已逝世，但其儘管出身貧苦，卻能奮勉向上；且能急人之難，樂善好施；尤其終生以講學培養人才為務；凡此風格皆對范仲淹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
范仲淹中舉仕宦以後，雖難以親自講學，⁸後隨其任官所至，每以興學設教，培育士子為要。如他進士及第，初任廣德軍（在今安徽省）司理參軍時，有見於士子並不向學，乃延請名師往教，士子受感召而致力於學，後遂有多人中舉。自此以後，歷官各地，皆致力

⁶ 沈括：《夢溪筆談·官政一》曾詳載其事，並稱「歲饑，發司農之粟，募民興利，近歲遂著為令。既已恤饑，因之以成就民利，此先王之美澤也。」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5年第1版第1刷），頁14-16。

⁷ 按范仲淹係以龍圖閣學士身分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，負責防守延州，故羌人稱他為「龍圖老子」。又按范仲淹之前任為范雍，治軍寬鬆，常為西夏人侵侮。范仲淹繼任後，號令嚴明，西夏人不敢犯。因兩人皆姓范，因稱范仲淹為小范，大范則指范雍。復按當時邊民另有歌謠曰：「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膽寒；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」韓指任陝西經略安撫使的韓琦，為舉薦范仲淹出任副使者。

⁸ 按范仲淹除於丁母憂期間，曾應晏殊之聘，在應天府書院掌教一段時期之外，一生大抵皆在仕途發展，但他後來雖居官貴顯，仍不忘講學。他泛通六經，尤長於《易》，學者多來從其質疑問難，他執經講解，毫不厭倦。

教育學子，如任興化縣（在今江蘇省）縣令時，乃創辦縣學；任蘇州（在今江蘇省）、饒州（在今江西省）、潤州（在今江西省）郡守時，皆奏請設立郡學。及至仁宗慶曆三年（1042），年五十五，任參知政事時，乃本於長期以來創辦縣、郡學的經驗及成效，奏請於全國各州縣立學，終獲同意而於次年實施，對於教育的普及發揮極大的功效。

頗值得一提者，為范仲淹於任蘇州郡守時，曾購置土地，擬興建宅邸，堪輿師於審視該處風水後，斷言必將踵生公卿。范仲淹認為既然是孕育人才的寶地，不宜獨享，乃於該地設置學校，以普遍造就學子，此即後來的蘇州府學。由此益發可見范仲淹公爾忘私，對於興學育才的重視。

五、獎掖後進，識拔人才

范仲淹除隨仕宦所至，在各地興學設教以外，對於刻苦自勵，頗具潛力的學子每能善加識拔，以助其在學術上有所建樹。以下即列舉最得范仲淹提攜之力，而在學術上有大成就的胡瑗、孫復、張載三人為例，說明如下。

胡瑗，泰州（在今江蘇省）人，自幼即好學能思，以聖賢自期。出身寒微，而肯刻苦向學，遂深通經術，而至湖州（在今浙江省）設教。范仲淹為蘇州太守時，聞知其人而愛敬之，因聘為蘇州教授，並遣諸子受學。時宋仁宗為更定雅樂，詔求知音者，范仲淹即以胡瑗對，胡瑗乃得以布衣授祕書省校書郎。其後，胡瑗又應范仲淹好友滕宗諒之聘為湖州教授。其教學重視明體達用，據載，「其教人之法，科條纖悉具備，立『經義』、『治事』二齋，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，有器局，可任大事者，使之講明《六經》。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，又兼攝一事，如治民以安其生，講武以禦其寇，堰水以利田，算曆以明數是也。」⁹因教法美備，四方之士爭往歸之。凡教授二十餘年，收效甚宏，人才蔚起。故朝廷於慶曆四年（1044）設太學於京師時，即下令取胡瑗在蘇州、湖州的教法為典則。凡此皆可見胡瑗之能按其理念講學，培養許多人才，成為宋學的開山人物，皆得力於范仲淹的識拔舉薦。

孫復，晉州（在今山西省）人，早年曾四次參加科舉考試，皆落榜，生活頗為潦倒，據載范仲淹曾加以接濟。其後孫復乃退居泰山之下，長達十年之久，潛心研討《春秋》之學，名聞四方。弟子石介，對他執禮甚恭，極有助於扶持師道，其後中舉而任學官，乃將孫復表彰於朝。於是范仲淹與富弼即共同上書朝廷，言孫復有經術，宜在朝廷，遂被任命為祕書省校書郎、國子監直講。

胡瑗、孫復二人皆出身寒微，但能刻苦力學，並在經學研究上有所創獲，同為范仲淹識拔薦舉，對於後來宋代學術的發展，發揮很大的作用，故皆被《宋元學案》列為宋學的開山人物。¹⁰

張載，世居大梁（在今河南省），後僑寓鳳翔（在今陝西省）。少孤自立，志氣不群，

⁹ 黃宗羲原著，全祖望補修，陳金山、梁運華跋校：《宋元學案·安定學案》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87年9月台1版），頁24。

¹⁰ 《宋元學案》將胡瑗列為〈安定學案〉，孫復列為〈泰山學案〉，據〈安定學案〉序錄記載：「祖望謹案：宋世學術之盛，安定、泰山為之先河，程、朱二先生皆以為然。」見《宋元學案·安定學案》，頁23。

與范仲淹早年的處境頗相似。初喜談兵，個性豪放不羈。當仁宗康定年間對西夏用兵時，張載年二十左右，慨然以功名自許，欲結客攻取失地，上書范仲淹，范仲淹知其遠器，有意造就，乃責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？」因勸讀《中庸》，張載乃有志於道。惟此時仍未能自信，復訪諸釋、老多年，終無所得，於是又返求六經，遂以《中庸》為門徑，精通《易》學，並以禮為教，終於創立北宋理學中的關學一派。

除以上三人以外，如與孫復共同扶持師道的石介，崇尚實用之學的李覲，以至富弼、張方平、劉牧、吳希哲等北宋初期在政教方面有所建樹的人，也都或親承范仲淹的教益，或因得到范仲淹的薦拔，而終有所樹立。由此可見范仲淹對於提攜人才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在。

伍、結語

孔子思想以仁為核心，認為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進而強調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¹¹明白指出能設身處地，具備同理心，為對方設想，始為求仁之道。

此種思想傳衍至孟子，則發展為主政者應與民同樂，達到「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。」¹²以至於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¹³的地步。此種仁民愛物的思想即為范仲淹繼承，而於如上節所述般，在各方面表現出來，並有感而發的在〈岳陽樓記〉中，自然流露出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之句，並且成為傳誦千古的名言。

按曾受范仲淹啟發誘導，輾轉成為北宋關學領袖的張載，在其名著〈西銘〉中有「民吾同胞；物吾與也」¹⁴之句，展現了民胞物與的宏偉胸懷。張載另有膾炙人口的四句教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¹⁵凡此皆屬受范仲淹之人格感召，並由自己精思力踐而自然流露出來的。

綜上所述，可見將〈岳陽樓記〉選錄為高中國文教材，不僅可以讓青年學子認識自孔孟以來傳承不息的仁道傳統，也可經由范仲淹所展現的仁者胸懷，培養其宏偉的格局、高尚的情操，而有裨於社會的健全發展。

¹¹ 朱熹著：《論語集注·雍也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2005年8月第1版第5刷），頁123。

¹² 朱熹著：《孟子集注·梁惠王下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2005年8月第1版第5刷），頁299。

¹³ 朱熹著：《孟子集注·盡心上》，頁309。

¹⁴ 張載著：《張載集·正蒙·乾稱篇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79年12月15日），頁62。按本為〈正蒙·乾稱篇〉首段，後常單行，稱〈西銘〉。

¹⁵ 張載撰：《張子全書·性理拾遺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據高安朱氏藏書本校刊《四部備要》影印，1966年3月台1版），卷14，頁3下。按《張載集》則列於〈張子語錄中〉，作「為天地立志，為生民立道，為去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與今人所習知者略有不同。頁320。